

菜价上涨 京城市民下乡包地种菜渐流行

日本、美国在上个世纪流行的种菜模式,如今在中国正悄然兴起

不是很冷,但天空是灰蒙蒙的,北京的初冬看起来有些萧索,退休工人尹瑞庆收获完地里的萝卜和大白菜,正一锹一锹地翻耕,为来年播种做准备。

他的地块位于北京六环外的凤凰岭脚下,在这个名为“小毛驴市民菜园”的地方,一个个小方地块星罗棋布,每个地块上各有名字,如潇湘园、谷雨。

“如果春天播种的时候,你来看,这里都是人,大人小孩,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。”尹瑞庆说。在北京,乃至全国,像尹瑞庆这样下乡种菜的城里人越来越多了,对于食品安全的担忧,催热了下乡种菜的风潮。

新一轮下乡热

2009年,尹瑞庆在报上看到新鲜事,京郊农场“小毛驴”招募市民种地,所种的有机蔬菜归劳动者。“我实在是太想种地了。”这则消息让老尹兴奋不已。他亲自跑到凤凰岭脚下,找到了这个农场,并花1200元租下了这块地。

过去一年,这块只有30平方米的土地伴随着他度过了很多快乐的时光。尹瑞庆每周两次到农场,拔草、间苗、播种、浇水,年轻时下乡的他将自己这次经历称为“再下乡”。

“每到地里我都心花怒放。”尹瑞庆说,耕作能给他带来水泥钢筋丛林中无法享受到的快乐。他在农场雇用的农民的指导下,按季节套种各种蔬菜,总计有30多种。

虽然享受着种菜的快乐,但是尹瑞庆告诉记者,他最初想种地,实属无奈。这几年,食品安全的问题连续不断,毒奶粉、毒豇豆、地沟油、农药超标……一次次挑战着尹瑞庆的心理极限,“我做过商业,我知道食品的流通过程,有些污染很难控制”。

像尹瑞庆这样,用脚投票的方式表达对食品安全深度忧虑的人为数不少,参与创办小毛驴农场的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石嫣介绍,去年,来农庄种地的市民只有15户,而今年,迅速增长到120户。

记者了解到,如今,这种下乡包地种菜的现象,并非小毛驴农庄独有。在北京的很多郊区,农民纷纷把自己的地分割出租。而上海、浙江、湖北、四川等地,也都有不同形式的招募市民种菜的项目。

虽然具有具体的统计数据,但是各地的包地种菜项目都在扩张却是不争的事实。这股下乡种菜热的另外一种衍生形式,则是雇农民负责种菜,种什么菜,是否使用化肥,都由雇主来决定。北京中关村的20多个白领就自发组织了买菜联盟,由北京郊区的一名农民负责帮他们



一对父女从京城跑到乡下种菜(徐潮图片)

种菜。据了解,这样的自发性组织在全国已经有100多个。

美日都曾经历过的

“食品安全背后是信任危机,更深层次的是人与自然的隔离,人与人之间的割裂。”对于这种新的“下乡热”,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周立说,“现在大众的食品体系不被信任之后,消费者和生产者试图进行联合。CSA是一种模式,这至少为消费者增加了一种选择。”

周立所说的CSA是英文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的简称,意为社区支持农业。下乡包地种菜和雇佣农民种菜这些新兴的农业模式都属于CSA。

2007年,周立曾赴美考察CSA农场,他发现CSA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过程。

1910年,全美消费者消费食品的支出有40%归生产者农民所有,50%归贸易市场所有,10%是农业器械、化肥、种子等的消耗性支出。到了1997年,农民获得收益的份额跌到8%,2006年是5%。“根据测算,到2020年,农民只能获得3%。”

农民收入剧烈下滑的“拐点”出现在上世纪60年代。当时化肥、农药的革命引发了农业和社会体系的革命,为提高产量,食品走上了工业化道路。这一方面带来了功不可没的产量的增长,另一方面却带来质量的下降,并对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污染。在那之后,美国七成农场破产,生产者蒙受损失,同时工厂化的食物给人造成越来越多的困扰。

“西谚有云:吃什么你就是什么。人们开始担忧,食物改变的除了人的体质,是否还包

括人的性灵?谁也不愿意像机器一样活着。”周立说。

CSA正是源于日益工业化带来的食品安全危机。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,一些发达国家纷纷找寻市场外的选择。1971年的日本,一群家庭主妇开始关心化肥和农药对于食物的污染,主动寻找有机农产品的生产者并与他们达成协议,规定生产者按照有机方式生产,这群家庭主妇则预先支付高于一般农产品价格的货款,这种方式叫做“Teikei”(日文“提携”),是共识或一起合作的意思。Teikei最初的宣传口号是“在蔬菜上看到农夫的脸”。

1986年,美国马萨诸塞州建立了北美第一个CSA农场,其核心理念是建立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直接联系,减少中间环节,让消费者了解生产者,同时双方共担农业生产中的风险。如今美国已经有近3900家农场采用这种模式。此后,CSA在全球广泛开展。

相当于买蔬菜期货

石嫣正是因为在美国农场实习而全面了解了这种CSA模式。2008年,中国人民大学与海淀区政府在京建立了小毛驴市民菜园,这成为国内首批CSA模式农场的典型。目前,小毛驴经营得有声有色,今年收支状况已经达到平衡。

“我们施用蚯蚓粪与麻酱渣等有机肥料,完全做到生态农业,客户可以监督农场的生产环节。”石嫣说。

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长温铁军看来,CSA自然天成,大家都是参与者,互相之间形成了信任和信用。“这可能是一

种更为长效的信任,同时,它还起到了降低交易费用的作用。”

对这种闭合链式有机农场,尹瑞庆也有很深的体会,他说,农民和市民互为朋友,这是真正的消除城乡差别,这里完全是城乡融合的一个缩影。

60多岁的王凤山原本是北京郊区的普通农民,今年他被雇到农场帮助市民种地。王凤山说,很多市民对种地没有经验,有些人甚至没有摸过锄头,但只要稍稍指导,三天内保证市民学会种地。

一块30平方米的地块能收多少蔬菜?王凤山说,如果经营得好,一般四五百斤没什么问题。“人勤地不懒”,这是市民和农民共同的结论。去年,尹瑞庆这块小地总共收了400多斤的菜,品种有30多种。

“中国的CSA模式农场要求消费者提前付费,这就与传统的消费模式付费取物不同,改变消费方式的观念是其发展的一个大问题。”这是温铁军的一个担忧。

但在尹瑞庆看来,这不是一个问题,“如果从价格上讲,我今年等于买了蔬菜的期货。春天菜便宜,但现在价格飙升,相当于赚了。当然,种菜是无法用价格衡量的,我治好了自己的颈椎病,又获得了快乐,同时让家人朋友也分享了自己的快乐。”

改变现有的种地模式

不过,包地种菜的模式同样面临着很多困难。在石嫣看来,目前的两大困难是市民并不是很接受只吃应季蔬菜的观念,以及消费者对CSA模式本身的不太认同。“美国是因为食品体系已经被破坏,反过来出现CSA,而中国相对小的城市,食品相对安全,还没有到完全被破坏的程度。”石嫣说。

无论是石嫣还是接受采访的专家,他们都认为CSA模式不会成为未来食品供应的主流,只会是目前食品安全问题上的某种补充或替代。而在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教授李里特看来,真正解决食品安全问题,还是要农民改变现有的种地模式。

李里特认为,分散的个体农民,不仅收益和利益无法保障,从事农业生产时也缺乏经营空间,“农产品在非常低价的线上互相竞争,农民没办法,要么不干了,要么滥用化肥,降低成本。而很多企业为了获取利润,忽视了食品安全的问题,包括农药、激素、抗生素,目的都是为了

降低成本,提高产量。”

在西方许多国家,采取合作社经营的模式,每户农民就是一个小公司,组织起来成立农协,形成公司和总公司的关系,形成规模产业化生产。农产品的价格依据生产成本、劳动时间、社会保障等来制定。李里特说,农业形成社会组织企业化经营后,农民依据市场做出预测,依据市场种地,避免价格大起大落,农产品价格会真正回归理性。与此同时,农民为了维护自身信誉,也会努力将产品做好,质量做好。

链接:CSA在美国

CSA模式(社区支持农业)起源于瑞士,1986年传入美国。

通常在一个CSA体系中,社区居民向农场购买类似“会员”的资格,到收获季时定期获得一定数量的时令蔬菜或其他农产品,包括鸡蛋、肉类、奶酪、鲜花、水果和家庭手工制作的面包点心等。

在美国,CSA农场的规模大小不等,既有仅几家会员的小型农场,也有会员超过千家、占地数百英亩的大农场。虽然在几百万个美国农场中,采用CSA模式的只占少数,但是其增加的速度正在加快。

对农场经营者来说,CSA模式使他们拥有稳定的销售市场,在蔬菜成熟甚至种植之前就可以进行预售,较早回收资金,同时,可避免生产的盲目性。

此外,由于摆脱了销路的压力,农场经营者有更多时间用在土地上,可以在精耕细作、水土保持和减少农药使用等方面花更多精力,使产品质量更好,而且对生态环境有利。

对消费者而言,加入CSA体系可以使他们得到新鲜、低价的蔬菜供应,还能参与农场的经营决策,根据自身需求对种植计划提出调整建议。

据《国际先驱导报》



一对夫妻在乡下菜地里享受自己的生活(徐潮图片)

新闻时评

编辑 陈培营 杨怀锁 电话 67655282 E-mail:szxw@znews.com

低碳社会是人与自然建立和谐共生关系

近日,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、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潘家华,就坎昆会议前景以及中国温室气体减排有关问题接受记者专访时说,需要强调的是,要从消费领域入手,对于奢侈、浪费型的排放,要加以遏制。如果不对奢侈、浪费型的排放加以有效遏制的话,低碳社会就建立不起来。(12月6日《浙江日报》)

现在本土任何一个地区都不可能继续不受惊扰,保有以牺牲环境为代价,挥霍化石燃料,把需用于子孙后代的自然资源都吃干榨尽的发展模式。因为从根本意义上说,这条路已是发展末路,即使是强走,也再走不了多远。这已是许多人的共识。必须要建设一个低碳社会,实施循环经济,减少二氧化碳排放。必须要拿出新的办法,尽早寻到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,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。

本土上每一项低碳社会建设的成就,都预示着社会与文明的进步,都关乎每个社会成员生活素质的提高。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,一些道理其实很简单。这是双向互动的关系,而不是单向平推的方式。建设低碳社会,应像潘家华所说的,针对不同地区的不同产业结构、不同发展水平来科学确定。在很多农村地区,温室气体排放已很少了。农村人均电力消费只有城市的1/4,你让它去减,也没什么可减的。建设低碳社会,是社会成员的共同行动,即便是个人,也要在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承担中,做出自己的承担。说得好,不如做得好。每个人的所作所为,构成社会的共同行动。

低碳社会既是经济与社会建设,也是人们生活方式的改良。低碳社会是个挺大的筐,这个筐里可以装下人们许多的创新思维和创意生活。举个小例子说,一些年轻或是腿脚不甚灵便的人,为达到纯粹的锻炼身体的目标,以带有自我强迫的方式,做着并不自在的室内室外器械运动,这给有的人带来了身体上的好处,但也给部分人带来意想不到的器物伤害。而要达到同样的目的,以低碳的方式则会好得多。比如,上下楼时,能不上电梯就不坐,到某个地方去,能步行就不以车代步,这样既低碳了,又有效地减少了其他麻烦。可谓一举两得,有益而无害。

低碳社会造就人们的低碳生活,低碳生活对于个人而言,还是一种生活态度,且是积极的生活态度。低碳社会就是绿色社会,更加人性的社会,个人消费方式与其关系极大。奢侈、浪费尽管是个人选择上的自由,但其终究不是一项人的美德。低碳社会建设,不是为了让人们在未来的生活中难受、憋屈,它一切的努力,都是欲接近绿色、环保、舒心、惬意这个目标。

今语

公民意识助推法治进步

改革,在中国历史上常常被称为“变法”。这表明了“法”在改革当中的重要位置,也体现了“法”对于改革的重要意义。

审视改革与法治的关系,可以有诸多思考。比如说,法治建设是改革的重要目标,法制完善是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,法律体系是改革的有力保障。再比如说,市场经济不只是一项经济模式,也是一种法律权利体系。

比较当代的改革与历史上的“变法”,会给人许多不同的感受,特别明显的一点,就是处于变革进程中人的状态。历代王朝的变法,记载于史书的多是推行改革的君臣;当代的改革,让更多的普通人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。

在12月4日法治宣传日这一天,央视“十年法治人物”评选揭晓。翻看每年的“十大法治人物”名单,十年法治进程生动丰富。这些年度标志性的人物,不只包括公检法系统的公职人员、法律专业学者、律师,更有一些与法律工作距离

比较远的普通公民,一些来自民间的“小人物”。他们有的没有接触过多少法律专业知识,只是按照自己对公序良俗的朴素理解执拗行事;他们有的认准了只有法律能改变自己所处的困境,在“讨说法”的道路上顽强坚持……这些“小人物”,尽管每年入选的人数不算多,却是当年“法治人物”中的亮点。在他们身上,体现着社会公众正在生长的公民意识。而公民意识,正是推动改革不可或缺的力量。

2006年度的“十大法治人物”之一——“反酒第一人”王英,便是他们的代表。河南女教师王英的丈夫因酗酒引发胰腺炎死亡,为此她开始了长达8年的诉讼,先是针对酒厂,再是针对工商部门中的商标管理机构,她的要求是在所有酒类产品的商标上标明“饮酒有害健康”。

颁奖词把王英的诉讼概括为:“从简单的一己之愤的宣泄变成满腔热血地为公众利益代言”,可谓恰当。以一己之

力挑战一个行业、一项惯例或者传统,不管“反酒”诉讼的结果如何,她的付出已足以让人心生敬佩。

实际上,“小人物”的勇气与奉献,已经推动了许多法律法规的修改,触动了相关方面的改革。人们不会忘记那些在孙志刚案中奔走呼吁的媒体记者和众多网友,他们的努力直接推动了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;张先著提起“乙肝歧视第一案”,他的胜诉促进了国家公务员体检录用标准的统一……这些“小人物”,他们对法治的追求令人尊敬,他们对法治的信念令人感动。

从法治的角度来说,“以人为本”就是要维护每个人的尊严和权利。而尊严和权利,正是公民意识的内核。社会成员树立一种公民意识,培养一份社会责任,将汇聚成推动法治建设的强大合力和深化改革的动力。如果今天的改革要套用“变法”的说法,那么,与“变法”之名相联系的,应该是中国公民。梅子

弱势的不是党政干部而是公平正义

近日,一项问卷调查显示,认为自己“弱势群体”的党政干部受访者达45.1%。专家称,刚性的制度、公正公平程序的缺乏,是当下中国不安全感产生的源泉。(12月5日《西安晚报》)

调查显示,45.1%的受访党政干部认为自己属于“弱势群体”是有着充分依据的。比如,激烈的官场竞争,严厉的问责制度和强大的网络监督;论资排辈的潜规则横行;既要有让上级看得见的政绩,又要有能让老百姓满意的民心工程;一些贫困地区公务员的工资收入有限,在物价尤其是房价快速上涨的背景下,只能“望房兴叹”,等等。要说这些原因是党政干部胡扯八道,那是在冤枉人。可是,这哪一项不是老百姓司空见惯的事?又有哪一项不是与他们的工作息息相关的?

严厉的问责和强大的网络监督,是一个正常的公务员监督体系中必须存在的,也是每一个党政干部必须要面对的。或许是因为以往这方面的问责弱了一些,公民的监督意识也不够强,才导致

个别散漫的官员们有些无法适应,甚至将此当成了“弱势”群体的借口。真的很佩服他们的勇气,如果这都算是弱势群体依据的话,估计全社会没几个不是弱势群体的了。

按理说,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,本是没有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之分的。眼下,不但有强弱之分,连很多党政干部都将自己划到弱势群体之中。作为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维护者,这些官员尚且自嘲为弱势群体,可以想象,普通老百姓估计就更难拥抱公平与正义了。如今的一些党政干

部,眼皮总习惯往上翻,在更高领导面前自然就觉得有些弱势了。如果他们都能够多往下看,多跟普通民众接触,多去体验广大民众的辛酸苦辣,或许才能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弱势群体。

玲珑



刘主应绘

“国考”过热 折射就业渠道失衡

刚刚过去的“国考”,全国共有141万考生报考,再次创下历年“国考”峰值。此番考录比达到87.5:1,其中,国家能源局某岗位以4961:1的竞争比例高居热门职位榜首。

“做官”为何对千千万万学子有这么大的吸引力?最容易想到的,莫过于公务员群体对资源控制和调配的权力,能为自身带来各种显性或隐形的福利甚至非法暴利。此外,所谓“规则的制定者便是规则的受益者”,作为公务员群体,在各种制度规章的制定和执行上,也确实存在诸多造福于自身的便利。这一点无须多举例——从官员天价公款出国游到官员子女高考乱加分,到官员私分保障房,再到各种职务“消费”,无不知深了公众对这一职业“美念交加”的复杂情感。

当然,任何社会现象都是多维的,其效应也可能是多元的,或者正作用与反作用比翼齐飞,或者负面效应之中也暗含了一点正面效应。对今天空前的“公务员热”,亦有辩证看待的必要和价值。

“学而优则仕”,可谓中华儒家文化的精神沉淀;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,自古亦是年轻学子的理想。显然,并非所有希望进入公务员队伍的年轻人,都只是单纯抱着捧回“金饭碗”、谋求锦衣玉食的庸俗目的,他们中,也不乏大批精英希望在“为官”之后,能够做出一番事业,造福一方百姓,立下一段功业。从这个角度看,今天的“公务员热”,倒也不一定比当年的出国热、进外企热、开公司热更庸俗更没追求。

从另一方面探析,现在一谈到公务员热,便会批评年轻人“求稳”、急功近利的心态不健康。不过反过来看,“求稳”其实也是一个社会进入成熟期的表征之一。实事求是地说,中国经过30多年市场经济的发育,市场游戏规则已初步健全;商品经济之初“一夜暴富”的现象越来越少,当年“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”脑袋倒挂也已得到明显纠正,当年不少党政干部嫌工资低而下游经商个案如今变得罕见……游离于“体制外”的高收益正在下降;回归“体制内”的好处则在日趋提高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公务员由当初择业的首选项变为大热门,恐怕还不能简单斥之为“浮躁心态”,相反,恐怕还带有某种社会心态从以往过分浮躁、焦躁状态回归的迹象。

其实,对于优秀学子趋之若鹜希望挤进公务员队伍一事,我们已进行了太多讨论和批评,连海外媒体也开始关注中国内地的考考热,担心“公务员热”会成为中国发展的障碍。这些批评和提醒,无疑都是睿智的,毕竟对于一个社会综合体而言,某种职业的过于受追捧,多少暴露了某种失衡。有名言云,政治莫过于平衡术。其实社会发展亦当以寻求均衡为要义,从这个意义上说,对“公务员热”的局部发烧,既不必大惊失色,又确实值得重视。

红丽